

第二章 满洲共匪的活动情况

第一节 以满人共匪为中心的时期 (反日统一战线试行阶段)

中共满洲省委的根据地过去设在奉天,1932年2月迁往哈尔滨,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满洲事变发生后,以奉天为中心的南满地区的治安,完全由日本军警负责维持,党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二、在北满存在着以哈尔滨为中心,以中东铁路为动脉的苏联势力。在这种条件下,不仅便于开展活动,而且针对日本势力向满洲的扩张,也有必要同在满的苏联共产党密切联系合作,与之相对抗。

三、义勇军、大刀会匪、红枪会匪等掀起的反满抗日运动,已遍及整个满洲。因而以此为对象的工作,如仍以奉天为中心,就其地理位置来说也难以开展。

四、以往,设在奉天的满洲省委是通过经大连或营口的水路和经山海关的陆路,同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自满洲国成立以来,在大连和山海关等地,满洲国当局加强了监视和检查,不仅是党员,连外交信使的往来也日益危险。结果研究采取由上海经海参崴进行联系的方法。上海和海参崴之间,有苏联的轮船频繁往来,不仅方便,而且安全。

另外,随着满洲事变后对满新方针的确定,工会国际机关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海参崴)内新设满洲部,负责领导满洲的赤色工会运动,1933年春成立满洲总工会筹备处。于是和海参崴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样,就更加有必要将满洲省委从奉天迁至哈尔滨。

如上所述,满洲省委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指导中心的所在地和运动的方针,进一步开展了工作。

一、过去,满洲省委的主要下属机构有北满、南满、东满和辽西等各特别

委员会。其中，北满和辽西两特委虽已瓦解，但又先后成立了下列各重要部。

1. 南满游击区

1932年7月成立磐石中心县委。

1934年11月恢复南满特委（1932年春曾因在奉天干部被捕而趋于瓦解）。

1934年12月成立通化中心县委。

2. 东满游击区

1930年8月成立东满特委（满洲事变前即已成立）。

1935年初成立安图中心县委（1936年初，改为东满特委安图代表团）。

3. 哈东游击区

1932年7月成立珠河中心县委。

4. 绥宁及密饶游击区

1932年7月成立宁安中心县委（绥宁中心县委，1935年11月改为吉东特委）。

1933年5月成立吉东局（1934年8月撤销）。

5. 汤原游击区

1935年成立汤原中心县委。

除上述党部外，在各主要城市还成立了特别支部。请参照附表。

二、人民革命军的成立经过

1. 南满游击区

1933年8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以原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为中心进行改编）。

1934年11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独立师。

2. 东满游击区

1934年8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

1934年5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独立师。

3. 哈东游击区

1933年夏成立珠河赤色游击队。

1935年1月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独立师（以珠河赤色游击队为基础）。

4. 绥宁及密饶游击区

1934年4月成立宁安反日游击队。

1933年7月成立饶河反日游击队。

1933年12月成立密山赤色游击队。

1935年2月成立东北反日联军第四军（以饶河、密山游击队为基础）。

1935年2月成立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以宁安反日游击队为基础）。

5. 汤原游击区

约于1933年末成立汤原反日游击队。

1935年6月成立东北反日联军第六军（以谢文东匪团为基础）。

6. 海伦游击区

海伦赤色游击队。

如上所述，南满和东满是以原有的赤色游击队为骨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其他游击区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的雏型——反日游击队。这些都是在三月信件下达后，开展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三、过去，满洲的反帝运动也同样是以反帝同盟为中心开展工作的。满洲事变后，根据新的路线，将重点转移到反帝民族革命运动方面，于是，将反帝同盟全部改组为反日会，1935年春成立东北反日总会筹备会，作为全满的领导机关。

东北反日总会筹备会的下属机构有南满反日总会（1934年8月成立）、东满反日总会（遭到破坏）、哈东反日总会、吉东反日总会、饶河反日总会（1932年6月成立）、汤原反日会（1935年末成立）等，是当前满洲最为有力的群众团体。

另一方面，在关内，1933年9月于上海召开了国际反战会议，会上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可以说是目前抗日人民战线的前身。它集中了原属于七个系统的众多团体，由上海反帝同盟进行幕后操纵。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为动员抗

日而成立的群众性组织。该团体成立不久，即因左倾的反国民党的色彩过于浓厚而被解散。但是，运动并未因此而中断。翌年，即1934年，它又以“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的名义出现。是年5月，于上海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以反帝同盟、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为核心），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联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在各地成立分会，开始了抗日运动。然而，在关内，这项工作并无显著进展。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日本尚未在华北开展工作，舆论界尚无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第二阶段），因而南京政府同中华苏维埃政府之间尖锐对立，同年11月赤色首都瑞金被攻陷。

然而，满洲的情况却与之相反，东北反日总会章程规定：

“本会以彻底抗日反满不做亡国奴，团结满洲三千万民众中一切反日分子，进行一致反抗斗争，将全体中国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居住于满洲境内之民众，从日本奴隶统治之下彻底解放出来为宗旨”（第二条）。

“本会完全同意并拥护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对日作战纲领，并承认本会为其会员之一，并号召满洲三千万民众为全中华民族解放，为武装保护祖国而斗争”（第四条）。

就是说，满洲的反日会虽然不是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分会的形式发展壮大（不过也有些地方成立了二、三个分会），但它却拥有同一宗旨，并作为其管辖下的团体迅速地得到扩大和加强。

四、在满洲，农民运动过去也是以农民协会的形式开展工作的。关内的农民运动自从国共合作以来，有了迅速的发展。其发源地是广东省的东江地区。1923年1月，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会，即海丰总农会。这一农民运动不久即扩大到广东全省，以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名义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它是根据国民党采取联俄容共方针实行改组（1924年）后，于同年7月公布的中国农民协会总章（农会法）而实现的。后来在中国各地陆续成立的农民协会都是以这一农会法为依据的。但其领导权基本上由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担任土地革命、建立红军等重要任务。

中国农会总章规定：

“农民协会……以联合并组织全国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实行农民自救，改进农村组织和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

农民协会会员的条件如下：

“一切居住在中国的自耕农、佃农、雇工、农村中的手工业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分国籍和性别，凡年满十六岁，经履行第二条规定之入会手续者，皆可成为会员。但具有下列各项之一者，不得成为会员。

- 一、拥有土地百亩以上者；
- 二、重利盘剥农民者；
- 三、处于同农民利益有冲突之地位者；
- 四、神甫、牧师、僧侣、巫觋等与宗教有关的当事者；
- 五、受外国帝国主义操纵者；
- 六、吸食鸦片和从事赌博者。”（第一条）。

早已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的满洲某些地区，如间岛、磐石等地，曾组织过农民协会。满洲事变后，政治和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根据新的形势，一月信件曾作如下指示：

“党应在扩展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在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内，尤其是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为民众政权宽阔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它应该调节农民与游击队间的关系，经常地供给游击队的食品，组织武装自卫队，党应用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指导力量，并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广大的中农群众。”

一月信件突出地强调了成立农民委员会的重要性。它说明，农民委员会就其性质来说，是农村的政权机关，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它有可能转化为人民革命政府下属的地方机关。满洲事变后，处于革命运动高潮时期的满洲，成立农民委员会必然作为当务之急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主要区别，不在于组织对象，而在于其政治性质。前者主要是根据一定的纲领，为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进行自卫的常设群众团体。而后者则是随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成熟而产生的农民自发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行政机关。

目前，作为满洲共匪活动的群众基础组织，主要是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二者在组织上虽有所不同，但其政治性质则是一致的，都是为未来的人民革命政府作准备打基础的组织。不过，农民委员会似乎尚未象反日会那样普及。

关于这一问题，共产国际曾有如下指示：

“在东北游击区内，有的地方成立地方人民革命政府，有的地方成立反日会或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拥有政权（如珠河），这些地方的政权虽然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在东北甚至全国民众间影响极大。”

“为了扩大反日游击战争和反日运动，应在各地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准备成立反日代表大会，或改善地方的反日政权机关，以期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下列作用：

- 1.在政治上团结民众，使之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 2.将武装的民众改编为游击队和农民自卫队；
- 3.领导各种工人、农民及反日团体的群众进行斗争，保护民众利益；
- 4.筹集游击队的军需用品；
- 5.镇压走狗和奸细。

根据各地情况，政权的名称可定为抗日救国政府，或反日会及农民委员会。

政权的纲领应根据人民抗日救国的需要制定。基本应包括下列内容：

- 1.一般同胞都应参加反日救国，不分政治派别、职业、性别、种族和民族，但必须真正参加反日救国者。
- 2.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的统治，建立人民的东北抗日救国政府。
- 3.反对蒋介石及其他卖国政府，同反满抗日的民众和军队取得联系。
- 4.武装民众，参加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建立东北抗日救国总司令部。
- 5.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
- 6.没收卖国贼走狗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抗日战士和贫苦民众，帮助民众改善生活（不没收逃亡民众和满洲国的士兵、职员财产）。

7.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免除一切强迫劳役。

8.给予一切反日民众以自由（集会、结社、罢工、言论、出版、武装抗日的自由）。

9.废除满洲国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所得累进税。

10.中、朝、蒙民众应同日本的革命劳动群众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人民革命政府的重要意义，在政治上，同满洲国走狗政府相对立，向全东北以及全中国人民发出政治号召，政府所在地可根据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经常转移。如果游击队为了作战或经济的原因，或为了便于活动和保存实力而离开原驻地时，则政府也随之转移。不应死守根据地，以防止损失武装实力”（共产国际致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件）。

如上所述，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是为人民革命政府（或抗日救国政府）作准备和打基础的组织。关于建立这一政权运动的开展情况如下：

1、满洲事变后，东满地方立即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一月信件发表后，又改为人民革命政府。昭和十年（1935年）春取消赤色地区后，人民革命政府解体，成立农民委员会。后来，随着东满共匪活动的衰退，该农民委员会也终于瓦解。其命运之所以如此坎坷，主要是由于东满地区的特殊原因所导致，与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同。

2、一月信件发表后，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动运逐渐发展并加强，企图成立东北临时人民革命政府，以统一领导正在建立游击区的各地方政府。1935年3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发表了纲领草案。

该纲领规定：

“东北临时革命政府是东北民众的革命政权。其任务是组织并领导东北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傀儡政府‘满洲国’，争取东北民众的自由平等和民族解放，促进中国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和进一步发展”（第一条）。该政权的基础在于“一切工人、农民、人民革命军和一切反日武装队伍的战斗员、指挥员，以及反满抗日群众”（第三条）。

1935年8月初，满洲省委在省委内部成立了自省委以下各级党团干部为委员的“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筹备委员会”，预定于“五卅”纪念日在哈尔滨召开全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政府。为此，进行了下列准备工作：

(1)、发表关于成立东北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的宣言(3月29日)；
(2)、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预定将政府所在地设于南满、东满、哈东、吉东等四大游击区中的最优秀的游击区内；

(3)、4月1日和4月20日发布红五月工作指令；

(4)、成立统辖各地反日会的东北反日总会筹备会。

结果，各游击区纷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筹备会，为取得各地方政权和向全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派代表而积极工作。但由于日本军警发动彻底的大讨伐，使该项工作归于失败。但据说，南满游击区于同年11月在辉南县石头河子一带召开了南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满特区政府。在哈东游击区也成立了区政府。

五、中共中央在一月信件中，把满洲的反日游击队分为四类：

- 1、纯由旧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如马占山、李杜部队)。
- 2、小部分为旧吉林军，大部分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所组织者(如王德林部队)。
- 3、各种农民游击队(如大刀会、红枪会等)。
- 4、赤色游击队。

二月信件关于上述各类游击队曾作如下指示：

“因此，满洲党必须经过统一战线的策略去争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到自己的手里来。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本意义，就是为着团结一切愿意反日的民众(不分党派的)去共同地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在斗争过程中反对反革命派一直到孤立他们，而完全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二月信件)。

而统一战线的基础则经常在于下层统一战线。

“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一月信件)。

“对于现在散漫自发而缺乏中心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满洲党必须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到他们中间，首先是主要的和我们影响较大的部队中间去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详细解释中央最近所提出来的对日作战纲领，说明统一作战的必要等等。随时揭破一切任何反革命派的欺骗和武断宣传，就是很小的机会都要利用着来作反对反革命派的武器。对于首领的任何动摇，都要无情地批评。必须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和士兵代表会议的组织，建立坚强的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团结投到义勇军中的城市工人的分子到反日组织和我们党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在下层士兵群众中建立了巩固的政治的和组织的基础，才能够实现我们党在游击战争中的独立领导”（二月信件）。

根据上述指示，各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1、南满游击区于昭和九年三月，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核心，成立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又于同年五月成立江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

2、东满游击区始终未能建立起有组织的统一战线队伍。这主要是东满特委极左主义作祟的结果。同时共匪和政治匪的民族构成不同，以朝鲜人为中心的共匪和以满人为中心的政治匪之间，存在民族隔阂和反感，因此，虽然能够联合作战，但终于未能实现组织上的融合。

3、哈东游击区自1935年以来，先后成立东北反日联军总指挥部和东北联合抗日军等，以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为核心，积极团结抗日势力。

4、在吉东游击区，以周保中为首的共匪参加了平南洋率领的政治匪，成立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共匪李万学部队和张魁部队参加了属于王德林系统政治匪李延禄部队，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军第四军。

5、在依兰地区，主要有赵尚志系统共匪参加了政治匪谢文东部队，成立东北反日联军第六军。

在上述工作中需要注意的是：

1、南满游击区和哈东游击区所执行的都是所谓上层统一战线，均未能持久。这主要是由于共匪的势力居优势，共匪通过统一上层对下层士兵迅速开展工作，并获得成功。政治匪感到这样一来，有使匪首孤立，丧失部下的危险，因而拒绝参加统一战线，从而导致其瓦解。

2、吉东游击区与上述两游击区情况相反，统一战线是以共匪参加居于优势的政治匪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是一个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典型实例。尤其是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情况更是如此。

3、南满和哈东两游击区，由于当地的阶级关系，存在着很多有利于共匪活动的因素，因而政治匪通过与共匪接触并联合，其部队迅速出现共匪化的倾向。这样，就使政治匪的领导人对抗统一战线持高度警惕甚至对立的态度。然而，从三江省到吉东地区一带，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对政治匪的活动极为有利，因此，执行统一战线不仅没有给政治匪带来很大危险，反而增强了战斗力，更为有利。正是这种原因，统一战线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成功。

4、就其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应称之为统一战线的试行阶段。有的地方获得成功，有的地方遭到失败，在某一阶段实行联合作战，而另一时期则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甚至解除对方的武装，以致削弱了彼此的抗日实力。造成上述不景气局面的原因在于：

(1)、关内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间激烈的对立斗争(蒋介石的剿匪)的影响。

(2)、满洲省委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实行阶级对立的土地政策，即允许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参照东北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第九条)。

(3)、机械地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上层统一战线则只不过是作为一种策略来运用。

六、以上是满洲省委领导各方面工作的大致情况，满洲省委内部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如下：

1、满洲省委于1933年迁至哈尔滨后，从翌年4月起连续遭到逮捕和破坏，使满洲省委一度蒙受重大打击，但立即着手重建，同年10月完全恢复，并开展了下列工作。

(1)、发行《农民委员会和民众政府》等宣传教育资料，制定《关于处理反革命以及间谍的秘密条例》、《省委三个月的工作计划》等(1934年12月)。

(2)、向苏联及中华苏维埃派出干部，进行培养，召集地方党员，进行训练(1935年1月)。

(3)、向地方下级机关派出巡视员(1935年1月)。

(4)、将中共中央派遣的工作人员分配到各地指导工作(1935年2月)。

(5)、其他有关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1935年2月以后)。

在上述各项工作的基础上,自同年4月开始,省委及其所属全满各级党部着手进行“独立的党部改组运动”。

这项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决议开展的。其目的在于,因远东危机日益加深,面临着日苏间有可能发生战争的紧张的战时状态,为了有效地开展拥护苏联的运动和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企图培养各地党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

“各级党部不必一一等待省委指示,可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各地情况,主动地解决一切问题,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为此,省委除加强海参崴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派出机关同省委间设立的独立交通机关密切联系外,省委避免同所属各级党部直接接触,使各级党部独立开展工作,从而将因讨伐逮捕等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预见到在战时混乱时期,交通联络网容易遭到破坏,以致使工作难以开展。因而这种作法有助于培养并训练自主的工作能力。

2、满洲省委的组织情况如下

中共满洲省委员会	组织部	劳动组合部
	宣传部	军事委员会
	秘书部	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筹备委员会

关于党部机关曾作如下规定:

“为了完成各项特殊任务,在各级党部委员会下可设部或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部或委员会均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挥的同时,还应获得所属党部委员会的承认,并执行其决议”

(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十五条)。

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对东北反日总会、满洲总工会筹备处、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1936年1月成立)实行领导,并采取交换代表的方式,对党的兄

弟团体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满洲省委进行统一指导。

3、关于满洲省委的人员组成情况，在1933年8月以前，由魏某担任省委负责人，他去上海后，同年4月李跃奎来满（过去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并带来了一月信件，担任临时主席，于10月被捕。后来又由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马某代理。1934年由于大逮捕，省委一度遭到破坏，但10月，中央特派老庄来满，作为组织部负责人重建省委。10月末又有中共中央特派员刘少奇来满，负责领导省委工作。1935年3月在海参崴设立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派出机关，根据中央指示，满洲省委由该机关领导，关于其后的主席人选问题情况不明。

关于活动经费，由中共中央每月给满洲省委寄来一千元乃至一千数百元。主要是由上海金城银行汇至哈尔滨金城银行。这一情况是1934年4月大逮捕时发现的，以后情况不明，估计可能仍然继续汇款，充作经费。但是，最近中共中央也蒙受打击，似乎对满洲省委的经济支援也陷于困境，省委将这一情况向共产国际申诉，乃由共产国际直接给予经济援助。此外，据说，如珠河中心县委等有力的基层党部也给予部分支援。

4、关于满洲省委的指令系统，当然要接受直接的上级机关，即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上海）的领导。但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不便于进行直接领导，而且中共中央又屡遭剿匪镇压，也难以进行领导。而与此相反，满洲国同苏联相接壤，满洲的反日民族革命运动，实际上是苏联所策划的对日作战。首先，它可以破坏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其次，在军事上，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势；第三、满洲国社会内部的崩溃，为苏联战胜日本提供了保证。因此，满洲国愈来愈显得重要。共产国际有鉴于此，乃于1935年3月，在海参崴设立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派出机关，直接领导满洲省委。结果，满洲省委虽然仍然是中央的所属机关，在形式上也并未排除满洲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范围，但是由于设在苏联境内的共产国际机关加强了对满洲省委的领导 and 联系，这就使满洲的共匪活动必然集中全力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过去，以东满特委为中心，曾多次建议满洲省委独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违背中国民众意愿的形式上的改变虽然未能付诸实现，但实质上已经这样作了。因此，最近满洲省委反对“独立论”，击中要害，给予彻底驳斥，不能不说是必

然的结果。

关于交通联络问题，一向设在海参崴的共产国际机关，自1933年以来，在苏联境内沿海州的格罗提阔沃设共产国际代表的交通处。另一方面，在满洲境内中东铁路东线（滨绥线）横道河子站以东至绥芬河站间，设立由满洲省委领导的吉东局和绥芬河交通处，二者间利用铁路或通过偷越国境的方法进行联系。但是，1934年4月，吉东局被破坏，8月中东路东线沿线的苏联籍俄国人遭到大逮捕，以及由于1935年3月中东路转让后，日满官方加强取缔等原因，原有的交通网一度陷于瘫痪状态，因而不能不重新设置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派出机关，以加强同满洲省委间的联系，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成立了独立的交通机关。

该机关的最高领导是交通总局，其下设绥宁、东满、南满、奉天、下江（松花江下游一带）等主要交通局，以及由上述交通局所属的各种基层交通站，专门负责各级党部间的交通联系。

关于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间的交通联系，在哈尔滨方面设交通总局，宁安方面设绥宁交通局，绥芬河方面设绥宁交通局领导下的绥芬河中心交通站。在绥芬河中心交通站之下，将东部国境地区的饶河至珲春之间，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分别设基层交通站，南部地区有四个，北部地区有三个。与之相对应，苏联方面也设置七个交通站，随时进行联系。但是，其中除南区的东宁交通站外，其他站都因日满警戒严密，工作很难开展。

5、如上所述，满洲省委除在游击区内设基层党部外，主要还以城市为中心，设有陶赖昭特支部、长春特支部、吉林特支部、奉天特委和大连特支部等，但都处于地下状态，工作无大起色。此外，在热河方面，还设有内蒙古委员会，负责领导热河地方的政治匪，据说还设有热河下级党委员会。

第二节 抗日人民战线的发展时期

去年（1935年）夏于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实际上自1928年召开第六次大会以来，已历时七年。其间，国际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

化，共产国际针对这一变化，对其运动方针，作出了历史性的修改。

国际政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苏联通过执行五年计划，开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有了成功的进展，过去的农业国一变为独立的工业国，创造农业集体化条件，扩大并加强军事力量，开始拥有在东西两条战线独立作战的能力。以上种种情况，提高并加强了苏联在国际政局中的政治地位。此外，还同巴尔干、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军事同盟，参加了国际联盟。通过上述活动，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在欧洲的外交和军事地位。

二、192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对立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共产国际面临着一系列殖民地问题。诸如区划经济运动、裁军会议的破裂、军备竞赛、国际联盟的衰亡、日本大陆工作的发展、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德国法西斯的抬头等等。在这一形势面前，共产国际出现了维护现状和打破现状两派的分化倾向。

三、共产国际经历了大战后世界革命高潮期的进攻时代（1919至1921年）、向远东扩张的时代、对中国进行工作的时代（1922至1928年）、重点拥护苏联的时代以及后退时代（1929至1935年）。目前，面临上述客观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制定新的方针。

共产国际是苏联执行对外政策的一个机构，它同正式的外交机关互为表里，从侧面开展工作。因此，共产国际的方针是随着苏联全面的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决定的。

苏联共产党代表曼努意斯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曾指出：

“社会主义在苏联所取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性的迷信。只要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飞跃发展，无论怎样落后的群众都会拥护它，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对于苏联来说，建成社会主义，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还有待继续努力完成。就是说，目前，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出现的人民群众的左倾，已经比共产国际更加威胁着资本主义各国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进一步加强对苏联的拥护，仍然是共产国际今后的中心任

务”。这说明：

一、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完成。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保卫苏联是共产国际的主要使命。

二、但是，应当正确评价业已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革命意义，保卫苏联的工作不能停留在以往采取的消极的理论性的战术上面。

“根据苏联的具体经验，必须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展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必须使对苏联的拥护，成为愿意积极支持苏联的广大人民、阶级、组织和政党战线，即人民战线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目前，单纯的宣传主义已经过时，必须立即转入攻势，提交广大人民进行判断，这比单纯地驳斥对苏联的反对和中伤更为重要。”

采取以人民战线为基础的积极的进攻性的保卫苏联的方针，才是共产国际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

三、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为了彻底发扬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针对法西斯独裁、作为人民民主的唯一拥护者而行动，应实行宪法的改革；

2、强调作为自由支柱的苏联的作用和意义，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3、强调苏联是国际和平的支柱，彻底放弃过去那种温和的反战运动，应该在民族的、国际的规模上把一切反战势力组织起来，使之与苏联的和平政策相结合，从而开展更广泛的共同斗争。

所谓积极地保卫苏联，意味着在人民战线的基础上开展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战争运动。而且，“苏联采取上述对内和对外政策，就更加便于接近一向置身于党的影响之外的群众。因此，它比共产国际的政策更加具有鲜明性和进攻性。即世界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摆脱了单纯的宣传活动时期，成为一支更加壮大的行动力量，能够提出比以往更加大胆和宏伟的使命。能够以苏联为依据，根据事态的进展，作出积极的反应，采取更加运用自如的战术。”也就是提供了采取各个击破战术的可能性。

四、关于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组成问题，季米特洛夫曾指出：

“共产主义者为了便于劳动者的行动统一，针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必须根据短期或长期的协定，同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劳动者组织采取联合行动。”为此，“必须在企业、失业者中间、工人聚居的地区、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中，通过选举制，成立统一战线的超党派的阶级组织。”

“必须在这一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成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

“反法西斯人民战线政府，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它可能成为针对反动的法西斯，采取决定性方针政策的政府。而且，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当必要时，应该由共产党建立这样的政府。”

五、埃尔高里曾对国际形势作如下分析：

“1、资本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目前历史时期最深刻的矛盾；

2、目前，这种矛盾的特别尖锐的表现是，日本和德国两大强国的帝国主义者公然叫嚣反苏战争，为了准备并发动这场战争，他们极力结成一系列反动的、法西斯的国家集团，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又受到帝国主义强国、英国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鼓励；

3、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切国际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同时也会造成资本主义列强在政策方面的分化。有些资本主义列强认为维持现状、拥护暂时的有条件的和平，是符合自己利益的。

“如上所述，国际形势是十分尖锐而又异常紧张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战争，而任何战争都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世界大战。”

基于上述认识，于是日本和德国就成为共产国际政策的“集中和进攻”的目标。

“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战斗力，同开展全国性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这一运动必须在对帝国主义压迫者、首先是在武装的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走狗所开展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旗帜下进行。中国苏维埃，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应该成为统一全中国人民的中心。”（季米特洛夫）

以上是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的要点，概括起来，主要内容如下：

一、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增强了国力，扩大并加强了其革命的意义和影

响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本身成为世界革命的决定性因素。

二、拥护苏联，保卫苏联不受战争威胁，今后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

三、苏联的拥护民主的政策和和平政策，有可能争取各国的反法西斯、反战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能够同与法西斯各国相对立的属于民主主义维持现状派的各国，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

四、因此，共产国际的政策不再是过去那样直接进行世界革命，同时，也不能只是消极地退却式地拥护苏联，而是必须采取进攻的积极的态势，针对特定的目标，以集中的、冲击的、各个击破的战术完成拥护苏联的任务。

五、为完成上述任务，目前采取的斗争形式应该是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抗日人民战线的组织。

其结果，众所周知，法国和西班牙成立了人民战线内阁。中国的抗日战线也正在发展，它作为苏联以日本为目标的进攻性防卫政策，而受到苏联的指导。它并非是中国劳动群众独立自主的运动，为了苏联，中国将要牺牲它未来的民族利益，阻碍亚洲民族正当的团结和解放。另一方面，将加速中国成为英美诸国殖民地的进程，就世界史的意义来说，它是反动的。然而，为什么它却能够在中国民众间深入人心，而且得以普及呢？下面仅就中国关内的共匪活动加以分析。

1934年11月10日，由于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国苏维埃的赤色首都瑞金被攻陷。对于按照“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经过周密准备而进行的这次围剿，共匪无力抵抗，乃于瑞金被攻陷前夕的7月15日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宣言》指出：

“从无数次同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决不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进攻

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1、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2、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与创建群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族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

宣言中提到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不知是哪支部队，但是当宣言发表后，于7月下旬，有一支红军部队从江西进入福建，经福建北上。该部队是刘仇西、寻淮州军。不久，于浙江南部同被逐出赣东北的方志敏军相汇合，成立东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方刘军，在安徽西部开展游击活动。据推测，所谓北上抗日先遣队可能指这一部队而言。但翌年1月，方刘二人均被俘，部队似乎也已瓦解。

上述北上抗日宣言的意义在于：第一是面临着江西苏区崩溃的危机，所进行的一项政治工作。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宣传抗日而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第二是继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之后，向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过渡。

红军从瑞金撤退后，于1935年年初，号称拥有八个游击区，十三万红军。朱毛主力在贵州北部，张国焘、徐向前军盘踞在四川东部，此外，还分布在陕西到湖南、湖北各省。朱毛军与张徐军于1935年6月汇合，兵力虽减至五万（同年初为八万），但终于实现了在四川集结的目的。

然而，不久他们即放弃了建设川康苏区的初愿，而且无法在当地久留，不得不进入甘肃。这主要是因为剿匪军的追击作战获得成功，以及偏远地区在经

济上无力支援大军。

9月，红军主力再次分裂，毛泽东、彭德怀军继续北上，企图开辟国际路线，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军返回，准备按原计划建设川康苏区。前者一万余人历尽艰险，于1936年初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军汇合，建立陕甘区。后者虽与肖克、贺龙军汇合，但未达到其目的，沿毛泽东军的行军路线，于1936年8月进入甘肃。于是，在陕甘地区大约集结了十万红军主力，初步取得了建设新苏区和开辟国际路线的胜利。

必须牢记，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是在瑞金失守的第二年，中国红军在偏远的蛮地颠沛流浪的时候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绍禹在大会上指出：

“有些人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既然在一部分领土内得到了胜利，同时阶级斗争已经非常剧烈，所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无疑义地，这是一种很大错误的观点。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事实已经证明而且正在证明，在目前的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们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为什么？因为中国正遭逢着空前的民族危机。这种空前民族危机的来源，首先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不断实行进攻和侵略，同时，由于国民政府对这种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

“现在问题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那么，我们国家和人民就能生存；如不抵抗外敌，那么，我们国家和人民就要灭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

“不错，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应用而且正在应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现在谁都明白了：如果中国共产党能真正地彻底地和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已形成了一副新局面，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到今天也应该有了更大的成绩。如果要问：这些错误发生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可以答复说：这些错

误之所以发生，首先是由于许多我们同志过去和现在都还没有了解近几年来中国所形成的新条件和新环境。”

如上所述，结成抗日人民战线，是作为一个紧急问题提出的。目的在于从退化状态中挽救中国共产党阵营，打开新的局面，向剿匪军实行反攻。

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联名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具体体现了由共产国际所确定的有关抗日人民战线的运动方针。其要点有二：一是“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人民政府”，一是“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国防人民政府的行政方针共有十项，按其性质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对日方针

1. 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2.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二、对内政策

1. 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2. 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3. 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4. 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5. 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6. 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三、国内民族政策

1. 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四、对外政策

1. 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从上述方针可以看出，其斗争对象是日本和汉奸卖国贼，应该动员的

人民大众，包括一切阶层的人民和国内的各民族。所谓“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主要是指苏联；“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是指英美各国而言。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发表《八·一宣言》后，又于12月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

“今日的苏联是有战胜敢于向他开火的帝国主义的力量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红军的威力），在向日本帝国主义使用一切和平方法无效（屡次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等），而日本反积极向苏联挑战的情况之下，苏联是准备着打击这个野蛮帝国主义的。这就把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汇合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中共中央十二月决议）

这主要是在开展抗日人民战线运动中，企图改变并缓和过去的政纲，扩大阶级基础。

一、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二、保护一切城市农村的小资本工商业，对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对一切同情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给予优待，并给予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一切白军官长（不分官级），士兵，凡愿反日反卖国贼者，都有受苏维埃优待的权利。一切白军官兵，愿意在红军服务忠心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者，苏维埃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抗日救国而从事武装斗争的军人兼地主的土地不得予以没收）；

五、不没收富农的财产。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

（其他家庭手工业者、手艺人、教师、小商人，以及自己虽不耕种，但确属过去以本人劳动积蓄买进的劳动者的土地，一律不予没收。只要不附加债务、劳役等条件，允许其出租。对于大地主兼商人，只没收其土地，不触动其

商业企业。)

六、对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采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保护他们财产之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

此外，陈绍禹就上述划时代的战术转变的原因和条件作了如下的说明。

一、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目前中国阶级力量的配置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工人阶级、农民和一般劳动者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为了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大众正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压迫、饥饿和失业，甚至连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越来越切实地感到，为了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各党派的政治立场有了明显的进步。……各派军队对于保国卫民事业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即在国民党以及其他派别的军队内，多数士兵和不少的中下级军官，甚至包括部分高级军官，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感到愤慨，因而经常出现整师整军的国民党军掉转枪口反对人民公敌。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性

1. 第一个特殊性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处于苏维埃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革命的两大主流，即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运动互相结合起来。……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是，通过大胆的、灵活的、正确的战术，把苏维埃革命的两大主流结合起来，不仅要团结革命的、有觉悟的、正直的分子，而且要把包括暂时犹疑的自己人或同路人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分子，即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最广泛的分子吸引到民族的社会的解放斗争中来，从而为发展中国革命提供更加广泛更加壮大的力量。新战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结成这种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2. 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的第二个特殊性是以帝国主义列强为敌。这一情况既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基本困难，同时，也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因为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人走狗，他们之间的对立日益激化，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联合战线。这就在客观上造成有可能利用反革命势力使之有利于革命的形势。……换言之，为了打倒最危险的、全国民

众最痛恨的，失去内外支援最为孤立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目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切场合、一切时机都要把革命势力集中起来。

3. 第三个特殊性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武装斗争具有长期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英明的灵活的方法、把无穷无尽的人民力量彻底动员到革命斗争中来，采用灵活多样的革命斗争形式和方法。

4. 第四个特殊性，就是苏维埃革命在中国领土上发展不均衡。因此，虽然历时数年，也只在辽阔的中国国土的一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但是，由于革命的脆弱性以及其他许多特殊性，时至今日，在已经取得胜利的数省内，尚未占领一个主要城市。这无疑是革命的弱点和缺点。然而，在事物发展的某个阶段，对于革命反而有利。因为，这样可以使苏维埃革命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可能性来积蓄和集结自己的力量，首先是军事力量。同时，面对压倒优势的敌军，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避免为时尚早的、准备不充分的、对革命不利的冲突。

三、中国红军及苏维埃势力的不断扩大及其脆弱性

中国红军以表现在其英雄伟业中的战斗力和卓越的军事技术，而使红军同情者为之倾倒，使一切旁观者确信红军是战无不胜的。因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其反对的根据，无论是他们的争取民族解放的心情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也好，也无论是单纯的同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对立也好，或是其他原因，都不能不承认红军和苏维埃是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和重要的军事因素。

然而，不断发展壮大的红军和苏维埃，不仅必须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而且还应该坦率地指出红军和苏维埃现存的缺点。问题在于，从实际兵力来看，只依靠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兵力是不足的；就其政治方针来看，至今还未能摆脱诸多影响，还不是苏维埃的信仰者。……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新战术，才是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把中国各民族团结在红军和苏维埃周围的唯一方法。

四、必须纠正正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改正苏区和非苏区中国共产党员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自满洲事变以来，曾多次采用了抗日联合战线的战术，但当时

的领导者对此认识不足，主要是作为一种策略来使用。因此，未能收到充分效果。……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首先是由于多数共产党员只重视土地革命，迷信阶级斗争，对于满洲事变后的中国，最紧要的任务应该是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一事等闲视之。因而，没有把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为党的最重要的政策，没有充分认识到需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根据上述讲话精神而开始的抗日人民战线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作为重要转折点的华北问题的发展过程。

1933年5月，根据塘沽协定确定非武装地区后，华北一度恢复平静。当时的华北政权是由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河北省政府（于学忠）组成。就中日关系而言，表面上起用的是亲日派或非国民党的在野要人，但就全面的倾向来说，华北自张学良下台后，日益实现中央化，内部排日思潮高涨。结果，于1935年初，相继发生所谓五月事件、六月事件等不幸事件。为此，日本驻华当局曾提出扩大在华北的自由定夺权和停止中央化工作等要求，并签订了梅津、何应钦协定。于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北平军事委员会先后于8月和10月撤消，于学忠因察哈尔事件被罢免，翌年1月由宋哲元接替兼任。

如上所述，华北的中央政权虽然瓦解，但多年来在军阀剥削下痛苦呻吟的华北农民的自治运动却乘机爆发了。1935年10月，河北省香河县因增加课税，每亩田赋增收一元二角，以此为导火线，县民激愤而起，处于同样遭遇的其他地方的县民也受其影响，于是自治运动从河北省全境一直蔓延到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11月国民政府发布币制改革和白银国有令，华北统治阶级拒绝执行。这一背离中央的倾向同上述来自县民的自治运动相结合，于11月25日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包括非武装地区二十二个县，政府长官殷汝耕），12月18日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包括除冀东以外的河北省、察哈尔省以及北平市、天津市等二省二市，委员长宋哲元）。不过，前者是脱离中央国民政府的自治政权，而后者在本质上仍隶属于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在华北的代行机关。

以上就是华北政权变迁的大致情况。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这一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野心操纵的产物，从而带头掀起了猛烈的反对自

治的运动。这一学生的救国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各界救国运动，共产党乘机大肆活跃，结成抗日人民战线的形势逐渐酝酿成熟。

“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中，直接以武力方式占领了满洲，终于遭致全中国民众的反抗。特别是由满洲民众和大批军警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反抗，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陷于严重的困境。日本帝国主义汲取了这一教训，此次占领华北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方式。因为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是将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最大障碍，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中国民众的耳目，减少中国民众的反抗，他们就利用南京政府的命令，让汉奸卖国贼组织傀儡政府，以达到占领华北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所采用的这种隐蔽的方式，虽然极为狡猾毒辣，但终究不能持久，将来必定发展为武装占领的形式。现在我们虽然不能明确地肯定这一过渡期的长短和将要采取的占领方式，但是，可以断言华北的目前局势（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南京方面在表面上保持的统一局势）决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会满足于现在的形势。因此，在最近的将来，将进一步直接武装占领华北，成立华北国（所谓华北政治的明朗化）。但是，这并非说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哲元，而只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武装占领华北。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需要象目前宋哲元这样的政府，只是为了利用他，企图在过渡时期内，缓和并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而已。

“将来华北的主人公究竟是谁？对此，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回答：将来华北的主人非“日本的××”，即“抗日人民的革命政府”。国民党之类的政府今后在华北将不复存在。

“应该怎样拒绝即将降临到亲爱的华北学生及文化界救国同志们头上的××，要立即作出计划。”（《致华北学生及文化界爱国同志》1936年8月22日）

其次，我们还必须就促进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获得发展的另一因素加以分析。那就是，中国自民国十七年政府北伐成功以来，从未出现过象今日这样接

近实现国土统一的时机。以下试举二、三必要的事例，说明这一情况。

一、政治的和军事的统一

1. 昭和八年，镇压了李济琛、陈铭枢及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
2. 昭和九年，击退绥远的孙殿英对宁夏的进攻。
3. 昭和九年，摧毁江西苏维埃区，攻陷赤色首都瑞金。
4. 昭和十年，朱毛红军退出四川后，四川实现中央化。乘贺龙、肖克红军入侵云南之机，云南、贵州两省实现中央化。
5. 昭和十一年，广东、广西两省实现中央化。乘红军入侵山西之机，山西中央化获得成功，并开展山东中央化的工作。
6. 昭和十一年五月，颁布中华民国宪法。

二、经济的统一

1.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实行币制改革和白银国有。从而加强了中央国民政府的经济实力，削弱了地方割据军阀的抵抗能力。

2. 在英美资本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后，中国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目前就整体来说，已摆脱了危机，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转入特殊的萧条局面。其主要特征是物价上涨，生产指数逐渐增加，利率下降、入超减少等。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不容乐观，但是，基本上摆脱了经济危机这一事实，巩固了中央政府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从而成为推动国内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央军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装备。昭和十一年三月实施兵役法，又制定了三年计划，正在对一千万人实行军事训练。另外，通过实行白银国有制，中央政府集中的白银都运往英、美、德各国，购买飞机及其他新式武器，借以扩充军备。浙江财阀吞并了广东财阀，以其雄厚的资本为基础，在英美资本的支持下，通过上述措施，国民政府正在稳步地实现其统一国内的目的。

上述国内统一工作的进展，为发展抗日人民战线提供了两个有利条件：

- 一、中央势力强有力地波及到华北，阻止了因华北自治运动而可能出现的分裂，导致企图实现国土统一的全民性思潮的兴起。华北同华南相比较，经济落后，封建色彩浓厚，但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以浙江财阀为中心的中国民族资本，力图将华北纳入自己经济范围之内要求，不能不随着国内统一工作的进

展而更加强烈。它同当时日本的华北工作发生了矛盾。这样，不仅要广泛地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运动，而且使这一运动的性质从过去的消极防卫转化为积极进攻。换言之，为国民政府过去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长期抵抗”等口号增添了积极的内容。

二、中国的国内统一和中央化的发展，作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政治伪装，使割据地方的军阀残余分子正在转向抗日救国，无论是西南派的反蒋运动、也无论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表现都属于这类情况。这种来自军阀投机主义的抗日运动，虽然充满了动摇和矛盾，但就全局来说，它却具有推动抗日人民战线运动发展的性质。

抗日运动中存在的两大主流，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苏联为背景的势力，和由国民党领导，以英美资本为后台的势力，二者虽然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但在从中国舞台上驱逐日本这一点上，逐步接近，在工作进程和方法方面，最近也出现了融合一致的趋势，从而构成了抗日战线发展的基础。基于这一原因，抗日人民战线正在形成全民规模的运动向前发展，它包括过去共产党势力基本未曾渗入的主要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小市民阶层，甚至包括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关于抗日人民战线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一、昭和十年，华北自治运动兴起不久，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学生运动，很快波及到天津、上海，以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到处举行抗日游行示威。

二、昭和十一年，运动进一步发展，大批学生参加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爆发了复旦大学学生和军警冲突、占领上海北站等事件。

三、这一期间成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也逐渐成熟，五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有十七个城市各学校的二十八名学生代表参加，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根据会章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学生，促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和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并作为其主张，提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规定的国防政府的政策相近似的要求。

四、共产党曾积极倡导的抗日人民战线，以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的形式，得以初步实现。在学生救国联合会召开大会的第三天，即从五月三十一日至六

月一日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有六十余个团体和十八个城市的代表六十余人参加了大会，其成立宣言中曾有如下内容：

“1.大会对于中央当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主张，在原则上完全赞同。但是，大会认为一面主张精诚团结，而一面又主张暂置外侮于不顾，先以内战手段排除异己，不独在理论上自陷于矛盾，在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不可能。尤其，中央最近颁布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不但丝毫没有表示在训政期间久已届满之后放弃一党的专政，反而想进一步一面在立法上巩固一党专政的基础，一面加紧对异己势力的压迫。……

2.大会认为，……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央当局曾有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表示，结果呢，历时四年有余，双方牺牲了数十万可以抗日的英勇的战士和无数量的枪弹，到现在依然存在着一个相持的僵局，而整个民族却已经陷于无以抗敌的苦境！这种事实证明，国内各实力派的斗争，徒便于敌人的侵略。……

3.……大会认为，在经济力量和武装力量上面，中央都占着高度的优势，同时在政治上，中央负有最重大的责任，自然也应该接受人民最严厉的批评和最迫切的希望。大会认为中央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只要中央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能够重新负起民族革命的任务，尤其能够赶紧切实领导起来一个抗日战争，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是不必顾虑的。……

4.大会认为，在目前，全国团结一致的实现，已经有了更大的光明。李宗仁氏最近已经表示焦土抗日的决心，冯玉祥氏最近主张停止内战，亲善苏联，合力抗日；共产党也已经修改了一部分的政治主张，表示愿和各党各派诚意合作抗日。同时，大会认为，在理论上，中国需要一个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革命，原为各方一致的主张。已往所争执的，只是应该采取手段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现在又刚好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之下，很自然地得到解决了。

5.大会认为，……如果内战依然继续，则一致对外仍然不可能。……大会认为，这种危险僵局的打破，是人民救国阵线当前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因此，大会很郑重地向各党各派建议：

- ①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
- ②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
- ③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 ④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的纲领的忠实履行；
- ⑤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后，爆发了西南派的反蒋抗日运动，抗日风潮随之高涨，该会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此外，于二中全会开会的同时，掀起了“对日宣战”的请愿运动。

五、此外，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8月举行上海市民缉私运动大会（抵制日货运动），6月28日成立上海作家协会，该协会的章乃器（原浙江省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上海市律师公会会长）、陶行知（国难教育社代表）、邹韬奋（生活日报社社长）等四人联名发表声明书《团结御侮的若干基本条件 and 最低要求》，还有，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开展的特殊活动等。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关内运动的开展对满洲抗日统一战线的影响。

正如第一节指出的那样，南满及哈东两游击区，过去曾多次试图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自从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倡议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关内的抗日人民战线有所发展以来，在其影响下，上述两个游击区的统一战线运动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

一、南满游击区于昭和十年（1935年）九月，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独立师为中心，联合抗日匪二十四四个部队，成立了抗日联军江北总指挥部。

二、同年十月，南满的东北义勇军系统抗日匪七个部队联名倡议成立以杨靖宇为军长的南满抗日联军。

三、其后不久，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等六个军的军长（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自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成立后，按其指示，从1935年开始，根据需要采用了东北抗日联军这一标志着统一战线的

名称)以及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副总司令孔宪荣、汤原和海伦反日游击队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八·一宣言。

四、过去同人民革命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朝鲜革命军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

五、哈东游击区的运动也有了空前的发展。

昭和十一年(1936年)一月下旬,赵尚志、李华堂、谢文东、夏云楷、李延禄、张寿篈、冯治纲等北满的著名共匪和政治匪于汤原县集会,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此外,第一、二、五各军的代表似乎也曾预定参加这一会议,但未能实现。

会议作出的主要决议有: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和扩大组织等问题。

会议就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问题,发表宣言指出:

“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是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的全满最高政治机关,人民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此联军临时政府即予以撤消。联军临时政府由全东北各种反日团体、反日部队和反日代表组成。”

宣言最后指出:“成立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组成国防人民政府及中国反日联军,团结一切反日的国家努力奋斗,确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和反日民众。”

另外,还列举十二条政纲。临时政府设七部二处(行政部、军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顾问部、秘书处、总务处)。决定由各委员长、副委员长组成政务会议,其中军政部(委员长赵尚志、副委员长李华堂)和外交部(委员长周保中、副委员长刘振东)组成政府主席团。

关于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作如下规定:

“关于军事指挥和政治指导,为了纠正以往的缺点,进一步加强反日力量,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在临时政府军政部的领导下,设总司令部。推荐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华堂为副司令。为了进一步开展反日运动,在各必要的地区设指挥部。

“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部、副官处,设参谋长及副官长,领导各种义勇军。

在扩大东北民众反日运动的同时，使一切工作实现组织化，政治化和系统化。

“根据目前工作的需要，应扩大南满、东满、吉东、哈东、虎林、饶河、宁安、热河的指导部。”

此外，会议还研究了成立政治军官学校以及宣传工作和外交政策。发表了对日作战通电、对日本宣战通牒，就成立临时政府告满洲国官吏士兵书等。

如上所述，关于团结反满抗日力量，并使其组织化、系统化的工作，在形式上基本完成。特别是政治匪积极活跃的北满地区，迅速地扭转了历来分散对立的局面，纳入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之下。

- 1.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1936年2月于汤原县）
- 2.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据说在密山县成立，详情不明）；
- 3.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1936年3月前后，于五常县）；
- 4.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1936年5、6月间，于依兰县）。

六、在吉东游击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与第五军合并，成立以周保中为总指挥的抗日第二军和第五军，吸收大量抗日匪，分为东线部队、中线部队和西线部队等三个方面，为开辟新游击区、确立同第一军和第三军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奋斗。

七、如上所述，除东满游击区外，其他地区的抗日人民战线运动都有发展，并逐步实现了组织化。这主要是由于排除了正如第一节中所提到的，造成过去统一战线处于消沉状态，从而停留在试行阶段的诸多因素的结果。即：

- 1.中国共产党运动方针的转变和包括国民党势力在内的抗日人民战线发展壮大影响。

- 2.满洲省委认为，在满洲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为时尚早，这样做有可能招致以地主富农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匪的反感，从而破坏统一战线。因此，于1935年11月重新指示只限于没收汉奸地主的土地财产（参照“南满部分”有关统一战线的章节）。

- 3.逐步纠正了过去将统一战线的战术机械地对立地划分为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的作法（参照“北满部分”有关统一战线的章节）。

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满人共匪的抗日人民战线的发展时期。而另一方

面，东满游击区却处于崩溃时期，即朝鲜人共匪的没落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其各种原因将在“东满部分”详加叙述，此处从略。这种现象不仅限于间岛地区，在全满各地普遍存在。如南满游击区的朝鲜人共匪、朝鲜革命军，密饶游击区的李学万匪等，都出现了瓦解没落的趋势。关于其一般的原因和特殊的原因，将在有关章节分别加以详述，请参照。

最后，试就满洲共匪的发展前景略作分析。

一、满洲国自建国以来，虽只历时六年，但已稳步地建立起作为现代独立国家的体制，产业和文化也都有了惊人的发展。但是，占满洲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很少直接受到这一恩惠。农民的生活由于受到农村中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农业危机的威胁，以及治安混乱所造成的破坏，同九·一八事变前相比，毫无改善。因此，如果不坚决实施以充分的人力物力为基础的农业和农民政策，就不可能使农民从封建剥削和贫困愚昧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可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也就无法向农民展示王道乐土的光明前景。如果认识到满洲的共匪活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农民暴动，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工作的重要意义了。基于这一观点，则最近公布的满洲国产业五年计划，对农业问题未免估计过低。从广义的国防观点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排除共匪活动的社会条件、农民贫困等因素而进行推测，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二、满洲国同苏联相接壤，经常受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增强国力的影响。两国国民不断地试图对社会主义政治和王道主义政治加以比较。其结果，民众必然要接受先进一方的影响。满洲国还是一个年青的国家，有必要更加努力奋斗，发挥王道主义的真正作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加以揭露。

三、最后一个问题是对华关系。构成满洲国的多数民族是汉族。因此，中国本土的民众动向会直接影响到满洲。满洲的共匪活动，在一切方面都受着中国本土民众思潮的制约。满洲共产党运动的历史已说明了这一点。值此中国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欲将满洲置于其影响之外，是极端困难的。从国内治安的观点来看，开展正确的对华工作，以削弱并消灭抗日运动，也是绝对必要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结论是极不能令人乐观的，在一定期间内共匪恐仍不能根除。